

肃镇华夷志

校注

高启安
邵惠莉

点校

〔明〕李应魁 撰



甘肃人民出版社

肃镇华夷志

校注

【明】李应魁 撰

高启安 点校
邵惠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肃镇华夷志/高启安, 邵惠莉点校.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3

ISBN 7-226-03343-7

I. 肃... II. ①高... ②邵... III. 甘肃省—地方志—明代 IV. K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512 号

责任编辑: 李保军

封面设计: 吴荣鉴

肃镇华夷志

[明] 李应魁 撰

高启安 邵惠莉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95 千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6-03343-7

定价: 25.80 元

序

《肃镇华夷志》四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稿，次年，张愚升迁他往，稿未竟而事辍；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州兵备道副使李应魁继踵其事，续成完秩。此书详记酒泉地区之史、地、人文，而明洪武五年（1372）进军河西以迄万历后期二百多年来肃州近事尤为详悉。是一部完整保存于世的酒泉地区最早的志书。

是书首出舆图二十幅，各有图说；次述沿革，疆域（附内地住牧番夷），西域疆里，山川，水利（桥梁附），风俗，物产，户口，城池，军制，马政，屯田，戎器，兵饷、驿传，公署，学校，坛壝，祠祀，古迹，诗歌，景致，堡寨，关隘，烽堠，奉使，宦籍，人材，科贡，烈女，流寓，仙释，灾降，属夷内附（包括种属、族类，住处，风俗，货利）等三十余目。建纲立目虽稍欠条理，而记事颇称详备。基本上荟萃了本地区古代重要史料，又保存了不少明代资料，为后来酒泉、临泽、高台、金塔等县、区地方志古代部分的编写莫立了基础，对河西乃至西域某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书中“西域疆里”、“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三篇尤为重要而难得。“西域疆里”记述了明代前期自嘉峪关往赴西域的三条道路、沿途所经、里距、居民状况、宗教信仰、风物土产，可补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之所缺，张雨《边政考》、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梁份《秦边纪略》皆予采录，即后世称为《西域土地人物略》者；“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两篇，详述肃州总镇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族属、来源、安置、迁徙、生业、风俗以及相处关系等诸多

珍贵史料，为研究肃州境内及周边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及瓜沙诸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他处不见的资料。此书备载本镇地理、兼说境内华夷，在我国边郡方志中颇具特色。书名《肃镇华夷志》，文简义赅，亦颇能括其要约。清顺治十四年（1657）肃州通判高弥高重修此《志》，却将上举最有特色、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妄施斤斧，大加砍削，而自诩其新书“博采备陈”、“今世无阙文不及之悲”，但吾人所见未必如许，反觉其取细遗大，买椟还珠，徒兴后人“阙文不及之悲”而已。

高启安先生得《肃镇华夷志》读之，入眼识宝，遂欲表而出之。乃邀邨惠莉女士同襄斯举，校勘、笺注多达九百余条，于此书之厚蕴余意多所阐发，其中不少条目可方之为专论之缩体。于此书、于读者皆大有裨益。《肃镇华夷志》之校注出版，使璞玉一拂尘蒙，兰田再耀莹光，秘笈得公于世，而孤本从此不孤矣。余读其书，受益良多，想读者一读之后，亦将有是余言。因题数语，用充为序。

李正宇 2005 年 9 月 15 日于兰州

前言

—

现存河西地区地方志中，除敦煌藏经洞出土之数种唐五代时期敦煌地方志和张澍所辑几种早期文献（《西河旧事》、《凉州记》、《凉州异物志》、《沙州记》等）外，最早的，要数撰修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7）的《肃镇华夷志》了^[1]。

《肃镇华夷志》撰修者为时任“钦差整饬肃州兵备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巡按直隶广东监察御史蜀内江李应魁”。目前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署为“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

李应魁，四川内江人，《明史》无传。清吴人寿纂、何衍庆修《肃州新志稿》谓：“李应魁，四川内江县进士，泰昌元年以右参将任，天启元年升按察使、凉州分守道。”^[2]据《肃镇华夷志》序，该志应在其任右参将之前，即在“钦差整饬肃州兵备副使”任上所撰修。

而今所存之《肃镇志》，实即《肃镇华夷志》。为何改为《肃镇志》，容后叙述。

《重修肃州新志》言：“《肃镇志》修于前朝万历丙辰，迄今阅两甲子，中间一百二十年事迹，漫无记载。”^[3]

《肃镇华夷志》的重刊者高弥高。据《重修肃州新志·名宦》：“续查得本朝肃州通判云：高弥高，直隶阜城人，拔贡，顺治十三年任。”又“续采本朝监收通判”条内云：“李楨，顺治十二年任；高弥高，顺治末任；吕夹钟，康熙元年任。”因此，高弥高任肃州监收通判在顺治十二年到十八年之间。

据今《肃镇志》前李应魁自撰序，可知《肃镇志》原名《肃镇华

夷志》，李应魁“因得抄录遗本，传系天津张公愚草创旧稿，嗣缘升任未竟，而嘉隆以后，则又述自乡耆之口，披阅再四，总之不离行都司志者。近是彼合此分，年久率无伦次，乃其名曰《肃镇华夷志》，则以内附羌回，惟肃最伙，今虽输款向化，作我藩篱，而笼犬羊于卧榻，揖寇盗于门庭，种类情形，政〔正〕与内地安危，相为倚伏。溯源穷委，因以名篇，意良可绎。于是名仍其旧，实核其真，逖稽广询，首增图说，以撮纲领，余俱芟冗删繁，摭遗饰质，凡隘险、署墉，士卒、钱谷，以逮文武、谱籍，附属夷情，罔不考订类辑，阅月告成。”创修于嘉靖年间，其创修者为“天津张愚”。李应魁《序》中所言“天津张公愚”，在《肃镇华夷志·宦籍》中有记载：“张愚，直隶天津人，进士，嘉靖二十一年任。”嘉靖二十三年，兵备副使为刘瑜。则《肃镇华夷志》草创时间为嘉靖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名仍其旧”也说明李应魁仍沿用《肃镇华夷志》原名。

《肃镇华夷志》，《明史·艺文志》无载。据《北平图书馆志目》载：“《肃镇华夷志》存三卷，万历刻本”^{〔4〕}，说明该志创修后，曾刻印并流行，惟流行不广。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5〕}也载有“北京图书馆存万历《肃镇志》三卷，存清顺治十四年高弥高刻本四卷”之说。如此，则万历本尚在。因此，张维谓“缪目载《肃州志》有误，实系《肃镇志》。疑《肃镇华夷志》即《肃镇志》。”其中“缪目载《肃州志》有误，实系《肃镇志》。疑《肃镇华夷志》即《肃镇志》”正确，而“北平馆将顺治刻本讹为万历刻本”恐不确^{〔6〕}。因此，《稀见地方志提要》谓“按此书书口题名《肃镇华夷志》，卷一第一行仍名《肃镇志》，据张维《陇右方志录》，谓‘万历原本称《肃镇志》，华夷二字为重铨时所加焉’。按重铨本惟版口加‘华夷’二字，原文实无更换。”^{〔7〕}此说亦误。按原序，万历本应为《肃镇华夷志》，重铨本才称《肃镇志》（因此，后文提到此志，通用《肃镇华夷志》）。

只是今日通过远程检索，在北京图书馆只有善本四卷三册顺治刻本，而没有《肃镇华夷志》，也找不到《肃镇华夷志》书目。而“长城小站网”^{〔8〕}则谓《肃镇华夷志》目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卷

三。如此，则缪荃荪《方志目》记北平图书馆志目《肃镇华夷志》存三卷，万历刻本或即该本。“卷三”或为“三卷”之误。

关于《肃镇华夷志》以“镇”之命名，起因于明代九个边镇的设置。《明史·西域传》载，明初“甫定关中，即法汉武帝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间，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9〕}甘肃镇为明代九边镇之一。据《明史·兵志》：“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10〕}九边亦称“九镇”。其中甘肃镇下辖十二卫三个守御千户所。“二十八年，开设肃州卫指挥使司，领左、右、中、前、后五所。永乐三年，裁革威虏卫，归并本卫，为中右、中中二所，共七千户，所隶陕西行都司。”（《肃镇华夷志·沿革》）《甘镇志》亦谓：“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将兵至河西，元守臣平章委的弃城遁，遂平其地。二十四年设甘肃卫，二十五年分设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卫。二十六年设使（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二十八年设右、中二护卫，三十二年裁革前、后、中中三卫，移右、中二护卫于兰县。永乐二年复设甘州前、后二卫及镇夷千户所。正统三年设古浪千户所，景泰七年设高台千户所。本司内辖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外辖山、永、凉、镇、庄、西、肃七卫。镇夷、古浪、高台三千户所隶右军都督府。”^{〔11〕}

明代有许多以“镇”命名的志书，如《延绥镇志》（〔明〕郑汝璧刘余泽纂修）、《甘肃镇考图略》（〔明〕周一敬撰）、《三镇并守议》（〔明〕翁万达撰）、《宣府镇志》（〔明〕孙世芳纂修）、《两镇三关通志》（〔明〕尹畊撰）等。但都以全镇作为志书范围，唯《肃镇华夷志》所述范围为肃州卫和镇夷千户所。因此，名之谓“肃镇”或即“肃州”、“镇夷”之缩略。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肃镇”为“肃州”和“镇夷”之缩略，则河西另两部明代以镇命名的志书《凉镇志》（〔清〕苏铎纂，顺治十四年刻本，甘肃省图书馆存复制胶卷）、《甘镇志》以及《西镇志》（〔清〕苏铎纂，顺治十四年刻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也

以“镇”命名，何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名之谓“华夷”者，据本书序言，“则以内附羌回，惟肃最伙，今虽输款向化，作我藩篱，而笼犬羊于卧榻，揖寇盗于门庭，种类情形，正与内地安危，相为倚伏。溯源穷委，因以名篇，意良可绎。”与前后创修的《甘镇志》、《凉镇志》、《西镇志》相比，《肃镇华夷志》关于环肃州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部分不惟占相当篇幅，而且创“种属”、“族类”、“住处”、“风俗”等目，开方志之特例，其价值与意义非他志所能比拟。因此，名之曰《华夷志》确与事实相副。只是受历史和时代局限，署名透露了作者视少数民族为“犬羊”、华夷限隔的种族主义思想。

《肃镇华夷志》共四卷，卷一为“图说”、“沿革（疆里、郡名、番夷附）”、“山川（形胜附）”。卷二为“水利（桥梁附）”、“风俗”、“物产”、“户口”、“城池”、“军制”、“马政”、“屯田”、“戎器”、“兵饷”、“驿传（铺舍附）”、“公署”、“学校”、“坛壝”、“祠祀（寺观附）”、“古迹”、“诗歌”。卷三为“景致”、“堡垒”、“关隘”、“烽堠”、“奉使”、“宦籍”。卷四为“人材”、“节孝”、“流寓”、“仙释”、“灾祥”。后附“属夷内附略”，下设“种属”、“族类”、“住处”、“风俗”、“货利”。共三十六子目，正文约八万六千五百多字。

其中“图说”共列“肃镇总图”、“肃州”、“嘉峪关”、“野麻湾”、“新城堡”、“两山口堡”、“金塔寺堡”、“下古城堡”、“临水堡”、“河清堡”、“金佛寺堡”、“卯来泉堡”、“镇夷”、“双井堡”、“盐池堡”、“清水堡”、“草沟井堡”、“深沟堡”、“沙碗堡”、“胭脂堡”等图二十张，并有“图说”文字。

另，该志李应魁的序中曾数次引用《总志》、《元志》（《肃镇华夷志》卷一《山川》“肃州卫”条）和《肃州卫志》（卷一“沿革”“肃州卫”条）。据张维《陇右方志录》载，肃州曾在元代撰修《肃州志》，明嘉靖前曾修《肃州新志》，均佚失。不闻有《肃州卫志》。李应魁所提《元志》或即元人修《肃州志》，或《大元大一统志》；《肃州卫志》或即《肃州新志》；《总志》或即《大明一统志》。存疑待考。

二

现今有两个《肃镇志》刊本，一个即本名《肃镇华夷志》者（以下简称甲本），而另一本亦名之为《肃镇志》（以下简称乙本），是台湾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年出版之“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第三百四十八号）。封面为“肃镇志（全）”，扉页钤“北京图书馆藏”印章，标“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四八号据清高弥高、李德魁等纂修、清顺治十四年抄本”字样^[12]。乙本由于台湾地区的影印发行，是目前各单位收藏和较为流行的本子，也是诸多学者常引用的本子。

乙本《肃镇志》为四卷，卷一为地理志：沿革、山川、水利、风俗、物产；卷二为建置志：公署、学校、坛壝、祠祀、驿传；卷三为官师志：名宦、兵防（军制、马政、关隘、堡寨、烽堠）、戎器；卷四为岁计志（户口、屯田）、人物（乡贤、忠烈、孝行、贞节、科贡、流寓、仙释）。约十四万多字。并附有地图六张。分别为高台周边地图、高台所城图、肃州周边图、肃镇城图、敦煌卫周边图、敦煌卫城图。卷一“地理志：沿革”下，有“李德魁纂修”之字样。

乙本《肃镇志》序署名为高弥高撰写，高时任“整饬陕甘等处兵粮分巡宁夏道按察司副使”。

另一“纂修”者“李德魁”不知其详。是否为“李应魁”之误，尚需研究。

从二者内容看，显然为两个不同的本子。不惟体例有较大差异，而且所记范围也不同。如甲本“沿革·疆里”，其范围只叙述肃州周边，即明代“肃州兵备道肃州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地界，“西自嘉峪关起，东至临河堡花墙交界止，广二百七十里；北至新修边壕，其长三百三十一里……东一面通于甘州，南有祁连火山^[13]为障”。（卷一“肃镇总图说”）而乙本所叙地理范围，“疆域：东抵山丹，西至高台，南临番夷，北接胡虏。广一百八十五里，袤三百五十里。里至：东至山丹卫界八十里，西至抚夷驿一百五十里，南至马营二百二十里，北至外境一百三十里，东南至大黄山二百五十里，东北至转嘴墩

一百里，西南至白城子六百里，西北至高台所一百六十里。”（卷一《沿革·疆域、里至》）《山川》一节开头即有“甘州左等五卫环以祁连、合黎之山”字样；《风俗（番夷风俗附）》一节前亦有“甘州左等五卫”字样。按“五卫”者，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水利”一节，主要叙述的是“五卫”的各渠。其他关隘、堡寨、烽墩等，均为甘州附近之内容，从疆域、里至以及山川、水利等内容看，所叙也主要是甘州五卫内容。而《序》中 also 说“凡甘之肇置本末，与夫山川所表、沟池土地之绵历，户籍贡赋之盈缩，风俗土产之宜，宦迹人物之众，郡治庠序坛壝社稷创治之始，僧寺祠祝^[14]桥梁陂池存没之由，仙释升华、词墨咏题，靡不博采备陈。阅月成编，镌板。”明确所撰志书为“甘”，即所记范围为“甘州五卫”。

因此，翻检与“甘州”有关之方志，才发现乙本《肃镇志》实即《甘镇志》。除了书口书名标“肃镇志”以及序作者为不同人名外，其他《序》文字完全一致，四卷题目完全一致，内容完全一致。

按《甘镇志》，现存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15]，序言标修撰者为杨春茂，序后题“顺治丁酉岁孟秋整飭甘山等处兵粮分巡西宁道按察司副使杨春茂撰”，书口亦题“（丁酉）重刊甘镇志”字样，官师记至明万历三十六年。

杨春茂，《甘州府志》有载：“杨春茂，顺天昌平人，举人，副使，顺治十三年任。”^[16]杨后是高向极，顺治十八年任，则杨春茂在任时间为顺治十三年到十八年。

《甘镇志》标“重刊甘镇志”，且“官师”记至万历三十六年者，当撰于万历年间。与《肃镇志》创制时间大体相同。

首先，顺治十四年刊行之《甘镇志》标为“重刊”，则“十四年”前必有另一刊本存世。其次，杨春茂为顺治十三年到任，十四年《甘镇志》“重刊”，足证非杨所修纂。其三，“官师志”截至时间为万历三十六年，如系杨春茂所撰，则不应弃置万历三十六年到顺治十四年近五十年的历史，更不应置清朝的赫赫武功于不顾。因此，其作者既非高弥高，亦非杨春茂。杨春茂序写于顺治，其内容和书名标“重

刊”透露，他并非《甘镇志》之真正的纂修者。因此，序中所谓“余于是勉力恪承，摭遗文于刻碑断石，访陈迹于荒丘废址，提纲举目，细大不遗……是书也，得之数行残简，访之舆论老稚”的说法，就有欺世盗名之嫌。

今人已然怀疑杨春茂并非《甘镇志》纂修者。“据本书春茂序所称重刊，而非春茂所重纂也。然阅春茂序中有云：‘靡不博采备陈，阅月成编，镌版’等语，似有重纂语气，故后之书目总录，以为春茂重纂也。”徐家汇藏书楼藏旧抄本《甘镇志》不著撰修者，也可证^[17]。

《甘镇志》和乙本《肃镇志》之序言内容相同，但署名却不一样，前者为杨春茂，后者为高弥高。那么，谁是真正的序作者呢？

据《肃州新志》和《甘州府志》，高、杨二人任肃、任甘时间相同，均在顺治十三至十八年间。而《甘镇志》和乙本《肃镇志》“序”署名一为“整饬陕甘等处兵粮分巡宁夏道按察司副使”，一为“整饬甘山等处兵粮分巡西宁道按察司副使”。除个别字有别外，“序”作者当为杨春茂。

那么，是何原因造成了将《甘镇志》冠戴为《肃镇志》呢？乙本扉页上钤有“北京图书馆藏书”印，标“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三四八号据清高弥高、李德魁等纂修，清顺治十四年抄本”字样，有“A932145”的书号，应即北图书号。显然，错置并非由台湾成文社影印时造成，而是在北京图书馆保存着这样一部《肃镇志》抄本。而根据抄本正文内容用硬笔所写，则透露出该本并非顺治十四年所抄，而是根据顺治十四年印本所抄，近代所为。至于如何出现抄本，如何张冠李戴，成文社为何舍故宫博物院（台湾）所藏刻本不取，而选取北京图书馆抄本影印，原因不得而知。

台湾版之《肃镇志》之流行，诸家不审其内容，以讹传讹，造成了不少误会^[18]。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

《甘镇志》中大量内容透露，它大段大段抄录了《陕西行都司志》。如卷一《地理志·沿革》第一句即“陕西行都司：《禹贡》：雍州之域。”在《沿革》一节中，包括了“武威郡县十”、“酒泉郡县

九”、“敦煌郡县六”；《疆域》则有“东界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据居延。广一千七百四十五里，袤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加以羁縻之地，无虑数千里”，“本司内辖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外辖山、永、凉、镇、庄、西、肃七卫。镇夷、古浪、高台三千户所，隶右军都督府。”这些远超甘州五卫辖地的内容。除此外，《物产》一节中，多有涉及西宁、酒泉、武威的内容。比如：“梨：河西皆有，唯肃州、西宁独佳。”“红花：各卫皆有，唯西宁市佳。”“锁阳……出镇番。”“无鳞鱼……各卫俱有，唯镇番与西宁碾伯多”等。其他从整个河西及青海角度记载的材料比比皆是，行都司范围的口气随处可见。正应了李应魁“总之不离行都司志者”那句话。

和《肃镇华夷志》相比较，二者在体例上大体一致，撰修时间相近，从内容看，抄录原《陕西行都司志》痕迹非常明显，说明万历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曾经有过一次修志的举动，产生了一批地方志书，由于很快明政府就处于风雨飘摇灭亡阶段，因此，匆忙所修方志大都比较粗糙，这就为清初整理、重刊这些方志留下了底本。比如，相同者还有标为苏铎所撰的《凉镇志》，标为苏铎所纂的《西镇志》等。这些方志大多内容下限在万历年间，志名统一以“镇”字命名，均刊行于顺治十四年，且均冠以“重刊”绝非偶然，而是统一修志和统一刊行的结果。显然，清顺治十四年所刊数种河西走廊以及青海等地（均属陕西行都司管辖范围）的方志，应为明万历年间所修，所据主要为《陕西行都司志》。因此，《甘镇志》的纂修者既不是杨春茂，也不是高弥高，而是另有他人。清人充其量只是在体例上稍作改动、重刊而已。清人换取原序，重新命名，不注说明，贪前人之功，据为己有，不仅恶劣，且给后世造成了许多误解。这可能也是台湾影印本将《甘镇志》误为《肃镇志》的重要原因。倒是高弥高在重刊《肃镇华夷志》时，虽改了名称，却保留了原序，不仅使我们知道了原志的作者和创修的时间，也使我们对杨春茂剽窃前人成果的行为有了一定的了解。

按《陕西行都司志》今不存，《四库全书·史部·地理》存目三

列有《陕西行都司志》。提要谓：“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作包节撰。考节字元达，华亭人，占籍嘉兴，嘉靖壬辰进士，官监察御史，出按湖广，抗疏劾守陵大珰廖斌不法，反被证下诏狱，谪庄浪卫，卒于戍所。隆庆初，追赠光禄寺少卿。事迹俱《明史》本传。此书记事止于嘉靖，且庄浪卫正陕西也。当即节书也矣。凡分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而以所属各卫分载其中，能阙所不知，故简陋而不荒谬。凡例为学校、祀典，不立类，以建置大端，惟止二事，故统置于建置之下，例殊未允，自郡县、山川、人物以外，无一不从建置起。能全附之建置乎？”^[19]。《明史·艺文志》载包节著《陕西行都司志》十二卷^[20]。从提要所反映的体例、内容看，《肃镇华夷志》、《甘镇志》等确实受其影响不小。比如，《肃镇华夷志》卷三“宦籍”与《甘镇志·官师志·名宦》一节所记之“陈九畴”，其文字相同，都批判《西域事迹》的观点，替陈九畴辩解。显然，其内容来自《陕西行都司志》。

三

作为现存最早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方志，《肃镇华夷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肃镇华夷志》不止一处引用《肃州卫志》（卷一《沿革》“肃州卫”条）、《元志》和《总志》，史料均未予记载。《元志》或为元代所修《肃州志》；《肃州卫志》诸材料没有记载，或者即嘉靖所修之《肃州新志》；《总志》或者为嘉靖《陕西通志》，或者为明人郭绅所纂《甘肃志》（据《甘镇志·官师志·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江西宜春人，弘治中任。廉勤有干，且瞻文词，尝纂《甘肃志》。故实有征。”），或者即《陕西行都司志》。提供了数种已佚地方志的信息。

由于肃州在明西部边疆的特殊地位和修志者的独特用意，《肃镇华夷志》尤其注重辖区的军戍防守，诸凡城池、烽堠、边墙（长城）、墩台、堡寨、关隘等军事设施无不备载、详细，而关于戎器、兵饷等也极尽细索，其中有不多见的关于守军装备中的用于治疗刀枪创伤的

药材名称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西部边疆兵防材料。

为了防备来自于南、西、北游牧民族、特别是来自于北部套部蒙古（所谓“北虏”、“套虏”、“海虏”）和西部土鲁番以及瓦剌等的侵扰，明代在北部边疆先后修筑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如著名的“长城”。《肃镇华夷志》不仅记载了辖区数次所修长城的地点，而且其长度、高度、走向以及长城的其他设施（烽墩、墩台）、防守路线、防守兵丁的配置等，一一清楚明了。另，该志还透露了有别于长城的另类防御工事，如紫紫、边壕、山壕等。而于西部雄关嘉峪关长城的修筑起因、筹划等记载尤其详细。因此，《肃镇华夷志》又是研究明代长城兵防的第一手可靠资料。

我们知道，五代至元，敦煌、肃州一线，由于战乱频仍，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而有明一代，处于恢复性阶段。《肃镇华夷志》详细记载了元、明洪武、嘉靖、万历等各个时期肃州卫、镇夷所的人口数量，记录了肃州及其周边农业水利恢复、发展的状况。《水利》一节，反映了从祁连山南麓引水和开垦农田，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向肃州周边开垦的历史。无疑对肃州的农业开发和水利建设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人开了西洞子，狗也不吃麸刺子”就是最形象的记录。而一些地区的开垦，又与安置东迁各部有关。可以说，环肃州周边农业开发，裕固族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有关稻米的最早种植（卷四“人材”：“邹和任指挥，教民树艺，稻田自和始。”）和玉米的种植，都是宝贵的农业开发资料。

在“物产”一节中，收有“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他麦，又名‘西天麦’。”这是较早关于玉米在西部地区种植的记载。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城镇，肃州历来是商贾云集、交易频繁的贸易中转地。明代弃置敦煌、退守嘉峪关以后，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州即担负起了中西贸易及使节中转的重任。即使在明代陆路丝绸之路贸易衰落后，肃州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频繁的贸易活动。《肃镇华夷志》透露，在肃州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马匹、丝绸、茶叶、毛皮、药

材、玉石等的交易。肃州居住的三种“夷人”中的“回回”，就是滞留或专门从事贸易的西域商人。出钱修桥铺路和修盖寺院的商人大多是“晋商”。这些材料无疑是研究衰落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参考，也是研究晋商崛起与丝路贸易、与明政府实行的“盐引”政策等关系的宝贵资料。而前来贸易、进贡滞留在肃州的西域商人、贡使及东迁的哈密卫及其他卫部众，如哈刺灰人、畏兀儿人等，其数量的不断增加（环肃州地区居住的东迁部众，一度达到接近汉人数量的程度），促使地方政府在肃州城建立专门的“夷厂”安置。这也就是顺治年间米刺印、丁国栋振臂一呼，而肃州有那么多回民揭竿而起的原因。

在卷二“学校”中，记载了肃州卫和镇夷所明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于校址的建设尤为详备。而当时的地方官员倡导、督促东迁各少数民族部众子弟入学接受教育的资料显得尤其珍贵：“又令夷童亦诵儒书，而夷俗少变。”（卷二）它多少改变了大汉族主义者一直推行的愚民和奴役少数民族政策，在裕固族发展史、民族教育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资料的缺乏，明代敦煌历史几乎是空白，而《肃镇华夷志》中记录了不少敦煌的资料。比如关于东迁各卫的记载，有不少涉及到了当时沙州的民族、人口变迁，居民生产方式以及与周边的关系等，可以说大大丰富了明代敦煌研究的资料和内容。

“哈刺灰”是出现在明代史料中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名称，是当时哈密城中三种居民之一。关于“哈刺灰”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19]。《肃镇华夷志》也记载了居住在酒泉城的“哈刺灰”人的来历、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从佛教转为伊斯兰教的过程。可为“哈刺灰”人的研究提供数条翔实、可靠的资料。

在“山川”、“物产”条中，还有诸如肃州产诸多宝石的记载：
如：

“狼心山：城东北七百里，亦套房经过之地，探贼者常至此取红玛瑙石为记。

火石山：城东北六十里，石可打火。

寒水石：出肃州南山，取烧熟，细面可以绘塑。

玉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有白色，俱可磨器。

代赭石：出肃州南山，高台者细红。

嘉峪石：出嘉峪关西，可作砚。先年，兵备副使长垣侯秩题其砚云：兹石三德，体制润泽，既不废笔，又不废墨。”

其中“嘉峪石”为我省又一著名笔砚石料，因发现于彭泽墓而知名。近年有关厂商多方找寻，以备开发。和《甘镇志》等志书相比，“物产”一节不仅具体，间或有奇闻逸事在其中，情趣盎然且价值独特。

这些宝石等的记载，为商业开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文化背景。

由于《肃镇华夷志》是河西走廊较早的方志之一，受到了清代西北学研究者的注意。清人梁份《秦边纪略》的诸多材料，虽未言明出处，但显然来自于《肃镇华夷志》。而黄文炜等撰修《重修肃州新志》虽言“先翻检肃镇旧志，见其版刻湮漫，笔画舛讹，至不可句”（“序”），但实际受影响不小，《新志》多处大段抄自《肃镇华夷志》。不烦举。

四

裕固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裕固族研究无论在史料的钩稽、整理，还是在各领域的探索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应当承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一样，裕固族研究，同样有一个历史资料缺乏的问题。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是散乱芜杂，语焉不详，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就裕固族历史来说，明末清初是裕固族形成的重要阶段，资料不可谓不多，有《明史》、《殊域周咨录》、《边政考》、《秦边纪略》、《甘州府志》等正史、野史以及其它方志，但恰恰缺乏裕固族东迁和七部形成过程的记载，更缺乏裕固族服饰、饮食、生产方式、语言、风俗等的详细资料，而这些，又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和裕固族形成、发